

我的父亲赵连城

赵友珍

编者注：赵连城，男，1911年2月生于温岭县大溪镇。解放前任海门同康酱园总经理，解放后任黄岩县海门工商联副主委，同康酒厂厂长，黄岩县政协副主席，海门区、黄岩县、浙江省人民代表，椒江市工商联筹备组负责人，一、二、三、四届椒江市（区）政协副主席、椒江民建主委、省民建常委。

我的父亲赵连城生于乱世，逝于盛世，他的大半生身处逆境，在不断拼搏中走完了人生之路。

1911年2月初五父亲生于温岭大溪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3岁时因生活困窘，随爷爷举家迁至湖州投奔太公处，但在乱世中，背井离乡并不能逃脱贫困的命运，爷爷先后与人合伙做榨油生意，去宁波邮局打工，终日辛劳却难以糊口，父亲12岁那年不得不重返大溪，而贫病交加的爷爷却客死他乡。

从此以后，父亲便与寡母弟妹一家四口相依为命，饱尝了人间的辛酸。

祖母俊秀、聪慧且目光远大。在他们寄居的祠堂隔壁厢房便是私塾，父亲在祖母的支持下，开始在私塾念书，读的书有百家姓、神童诗、唐诗之类，父亲年小理解不了，只是照背而已。授课时，祖母在房内一边替人做针线，一边侧耳细听隔壁厢房的授课声，尽管她不识字，可是等到夜里，她叫父亲背书，何处背错，何处背漏，她居然能当场指出教他。

无论酷暑，还是严冬，青灯一盏在前，祖母督学在旁。由于祖母严教，父亲从小就非常用功，做事认真，从不草率姑息。慈母识礼，更使父亲胸襟开阔，处事待人谦和宽厚。

但这种生活维持不到三年时间，一场瘟疫蔓延使父亲和叔叔相继感染了伤寒。因缺医少药，病体日渐加重，急得祖母求神拜佛，延医治疗，限于条件，侧重于对父亲医疗，叔叔却落下终身残疾，一家人悲痛不已，从此祖母便再也无力支撑下去了，父亲不得不洒泪惜别师友，离开私塾，此后他再也没能进一天学校。然而这份眷恋和遗憾却使他的下半生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不幸与痛楚也激励着他一生自强不息地学习。

因生计所迫，仅 13 岁的父亲便进了临海同阜康酒号做学徒，不久同阜康并入了海门同康酱酒总厂。

父亲离家之前，祖母含泪殷殷嘱咐：“你到临海学点技艺作终身生活依靠，做学徒一出门三年不得回家，要尊师长，守规矩，商店每天与钱打交道，不能贪一分

不义之财”。唯恐父亲吃不了苦半途而归，还叮咛：“做学徒要做人家不能做的杂务，家穷无衣食，全靠自持，我在家只听你的好消息，否则中途回家，亲友邻里都瞧不起……”。带着慈母的眷恋与训导，父亲开始走上茫茫人生路。

学徒生活异常艰辛，烧饭、买菜、打扫卫生、做杂务、站柜台，白天辛劳自不必说，最难熬的是每晚要到11点关店门后才能躺到柜台上睡，冬天一床坚硬的薄被令他彻骨冰寒，只好拿麻袋压在身上御寒，天不亮就起来开始做第二天的生活。父亲虽年幼却深知身为长子肩上的重责，最苦最累，一想到祖母的慈爱与无奈，想到望子有成的嘱咐，便没有什么不能咬牙挺过。四年学徒期满，由于他的刻苦学习和工作，17岁开始在同康担任外帐。此时的他不再是一个懵懂的青年，目睹祖辈的悲惨遭遇，经历浸濡着血泪的童年，又与劳苦大众在社会的最底层摸爬滚打，满目的疮痍，满腹的辛酸，在他心里沉淀、沉淀……。他不停地追寻答案，怎样才能让自己和身边这些苦难深重的伙伴摆脱悲惨的命运？不断的思索，终于在他的心底里产生了一种朴素的人生观：只有实业才能救国，只有国富才能民强。他暗自下决心要踏踏实实地为振兴民族工业出点力。

他不断地在企业中探索，细心观察，实地研究，向前辈请教，对同康在经营中暴露的弊端逐渐了然于胸，一幅发展同康的蓝图在他心中形成。由于他的精明能干

和创业之志初露锋芒，受到了总经理徐景珊的赏识，19岁时，父亲被提升为临海同康分店经理。

那时临海分店所销的产品由海门总厂供应，然而时局纷乱，战事绵延，不时使交通梗阻，分店行将倒闭，父亲年轻不乏魄力，当机立断，独手在临海创建酿造分厂，就地产销，不仅保证了供应，而且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使奄奄一息的分店呈现生机。

父亲虽为分店经理，但待遇很低，每月工资 11 元，这时他既要负担祖母一家生活，又要替爷爷生前还债，痛感苦难生活没有尽头。不觉间，已到谈婚论娶的年龄，1935 年，父亲 25 岁时，尊母命媒妁言，与我母亲结婚，两家可说是门当户对，清贫如洗，门弟萧然，论关系有中表之谊，说距离炊烟相接，从此夫妻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度过 40 年的风雨人生。

抗战胜利前夕，总经理徐景珊病危，自知不起，其时胞弟云珊原为副总经理，本可弟顶兄职，但徐景珊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破格向股东会推举父亲为继承人，并将云珊调离海门。

1946 年 5 月，父亲 36 岁时走马上任总经理，而此时的同康酒厂经受八年抗战的灾难，业务萧条，日寇抢劫，元气耗尽，只剩下徒有虚名的空壳，留给他的是一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父亲开始走上艰苦的振兴企业路。上任后厉精图治，身先士卒，将战时关闭的厂店次第恢复生产和开张营业，同时

整顿企业，更新产品，新法配方，科学酿造，精益求精，其生产的“双鱼”卫生酱油和“洛泗”酱油闻名遐迩，成为台州地区名牌产品之一。此时企业生产蒸蒸日上，到公私合营时，同康酿造厂的资产占海门工厂企业总资产的 60.1%，父亲也成了工商界的佼佼者，曾有人赋诗赞颂“连天碧月冲宵汉，城廓风云起壮图”，足见他的凌云壮志。

成功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父亲从不与人言，然而可以想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从学徒做起的无名小卒，赤手空拳闯下这份事业是何等不易。在我幼时，只见父亲早出晚归，平日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只有深夜，当我从朦胧中醒来时，父亲在灯下奋笔疾书，母亲作伴添茶加衣的身影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父亲身为总经理，但不是股东，拿着月薪 20 元生活，1948 年春，同康股东黄锡玉因其亲属患病身亡，要求退股，此时由朱祖齐介绍，将黄锡玉同康股份 1/22 出让给父亲，其目的无非是让经济利益与父亲工作相挂钩，名为照顾，实为要父亲买下股份。这 1/22 股份折合七两黄金，当时父亲坦诚相告“我没有钱”，“那么先付三两”，“三两也没有”，后来无可奈何只好向人求借，于是向王子鑫和同业陶雪谨先生各借壹两，尚余的四两拖到解放后从每月 76 元工资中扣除，直到 1952 年底了清这笔债务。为此母亲和我们无不埋怨父亲买个资产阶级当当，“一生辛劳皆清贫，赢得虚名招祸来。”

创业的艰难使父亲从实业救国梦中觉醒，繁重的苛税，混沌的吏制，外商的挤兑，党棍的敲榨，无一不使忍气吞声的民族资本家在这乱世中孤立无援，岌岌可危。眼看诸多同行苦苦支撑的企业，犹如风中残烛，顷刻间便倾家荡产，工人们更似风雨中飘飞的残叶。同康虽然发展起来，可是随着父亲对危机四伏的工商界实际状况的深入了解，他的梦想破灭了，他苦苦地追寻一条路，一条既能使自己立足又能解救大多数人的路。其时解放战争的序幕已拉开，1948 年底的海门，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共产党一来就要共产共妻”，一些不明真相特别是有钱的人都吓得逃跑了，海门一时成为“万人空巷”。一些恐吓信向父亲飞来，“你不逃跑，共产党一来首先革你的命”。他困惑彷徨，何去何从，在这历史的转折关键时刻，父亲面临着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抉择。通过亲身经历，父亲痛恨这个民不聊生、商不经扰的黑暗社会，也促使他最终幡然醒悟：没有清明的政治，没有安定的社会，实业救国是一场梦。冲破黑暗的政治，迎接一个充满生机的政党，才是自己的出路。共产党将到来的消息，燃起了父亲的希望，此时海门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却岿然不动，因为他已确立了新的人生座标，并决心以行动迎接革命，迎接新的社会，他相信新的政党能够解救劳苦大众，他期待能在新的时代实现他的理想。

这时起，父亲开始在夜里提着一盏昏暗的灯笼去朋

友家筹集资金，以资助部队。1949年4月的一天，地下党徐德同志（解放后任海门区区长）通过商会与父亲接上头，开宗明义要他负责筹款补给军需，他既欣喜又激动，不仅倾囊捐款以解共产党的燃眉之急，还动员其他酱油业如陶元康等捐出款项。至6月20日，先遣部队提前五天进城，父亲又满怀热情地买了50石大米给解放军送去，直到6月25日海门正式解放。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更加努力工作，他进步的思想，杰出的才干，踏实的作风，忘我的精神，不但赢得了卓著的声誉，也受到了共产党的信任。除了在同康任厂长职务外，还在政协、民建、工商联任重要职务，并被推选为区、县、省历届人民代表。1983年参加全国民建“四大”、工商联“五大”会议，受到当时总书记胡耀邦接见。

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物，父亲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动他联系的阶层，积极完成党和政府各个时期的任务。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我国出兵支援朝鲜，父亲深受感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爱国活动，他带头捐钱，并发动工商界筹募资金在全区名列前茅。父亲在拳拳爱国心激励下，为筹款变卖了家什，而家中的生活却因此而拮据起来，记得一个寒冷的冬天，弟弟因上学无排球裤穿而哭闹，父亲只好拿自己的旧裤叫母亲剪短缝小给他穿。有一回

姐姐邀一同学来家共学，临近午饭时分，姐姐留同学在家用餐，急得母亲背地里直埋怨姐姐不懂事，家里只有盐和酱油何以招待客人。50年代初，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竟如此窘迫。

全国“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这是对广大工商业者的一场严峻考验，父亲以自己的行动展现了他在工商界的楷模作用。为配合税务部门查帐，他亲自改革了会计制度，建立健全新帐册，并在工商界推行。在营业税联评所得税清缴时，父亲经常到深夜12点回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担任总经理的同康酒厂总是带头确认，并对同行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说明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关系，使许多思想滞后的工商业者觉悟得到了提高，也促使这场运动的顺利开展。在资金不足、酒厂面临停工待料的情况下，父亲去找林正区长汇报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得到他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为了恢复生产，在国家很困难的情况下，马上给予银行贷款，结果生产很快上去了，税也缴清了。此事使他深感党的温暖，曾赋诗：“时逢风雨知寒暖，事到艰难感慨深。”从此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掀起高潮，父亲热烈拥护，带头申请要求改造企业进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带动了整个工商界。人说诗言心志，他的言行由衷地表达了对党的一片赤诚的心。

这段时期，父亲废寝忘食的工作，没有节假日，也

没有 8 小时工作之限 每天清晨 6 点出门，夜里 10 点以后回家。过度紧张的工作，健康每况愈下，渐渐地结核病菌侵袭了他的肺部，开始他并未察觉，后来病情愈来愈重，一天夜里，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突然吐血来，当他被送到医院时，才知得了肺结核。母亲举债为他治疗（那时药费自理），增加营养，所谓营养，无非是每天一个鸡蛋半斤牛奶，这些东西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消费而在当时已是奢侈品了。尽管生病，父亲却从未停下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结核钙化了，他又马不停蹄投入工作，很少顾及我们。有一次母亲在切年糕时，我那 12 岁的大姐伸手去取，母亲不慎将她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两个手指头切断，当父亲得知此事时，急得捶胸顿足，心痛不已，他虽对女儿疼爱有加，但实在无法分身去医院，家事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

父亲忘我的工作，无论厂里生产还是社会工作，成绩斐然，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1956 年光荣地出席了全省劳模大会，会后省统战部长，民建工商两会主席接见了与会的十一名私方代表，而父亲作为唯一一名正职厂长，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与勉励，沙文汉省长特意宴请他们，江华书记在宴会上作重要讲话。这一切令父亲感动不已，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做了一些工作，蒙党对我厚爱，给我以至高荣誉，此生当呕心沥血回报。”他以他的行动至死不渝实现这一誓言。

60 年代初，父亲除了负责厂里生产外，还忙于参加

各种社会活动，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那时大家谈论得最多的是社会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问题，究其原因：入学难、就业难，1962 年海门仅有一所中学，只能容纳六个班 270 名学生，而每年小学毕业生达 1300 多人，眼看着一千多名青少年流落在外，不禁勾起父亲对往事辛酸回忆。作出一个“我要办学”的决定。他向政府提建议、谈设想、话方案、勾蓝图，意见得到区政府大力支持，同时引起共青团、妇联干部的共识，区政府即决定在海门农牧场划拨 70 亩土地，父亲主持的工商联资助 5000 元，在建筑造价低廉的 60 年代，5000 元可算得上是个可观的数目，经费不足部分由县里拨补。就这样在一无资金二无校舍三无师资的情况下，很快建起了一座海门中学，可容纳 15 个班 800 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成为技术人才和业务骨干。因为是民办公助学校，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由王学村区长担任主任、父亲为副主任，一周年校庆时，父亲还与区领导和全校师生合影留念，没有想到这张照片后来竟成了“文革”时资产阶级办学、为牛鬼蛇神服务企图复辟的反革命罪证。

为了解决部分人员的社会就业问题，父亲又不辞辛劳，克服重重困难，在工商联办起了一个百多人就业的草包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佳，当年被错划右派生活无着的周雁飞先生，在父亲安排下进了草包厂负责业务。无论是办校或办厂，父亲从未拿过分文报酬。

1966 年“文革”开始，父亲难逃厄运。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一切污水向他泼来，接着被关押、批斗、停薪。在那个颠倒是非黑白的年代里，父亲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我的家庭在风雨飘摇中恶梦接踵而至，祖母和母亲贫病交加，在日夜担忧和惊恐中相继辞世。父亲对祖母克尽孝道，这在亲戚邻里是有口皆碑的。

“文革”期间，父亲身陷囹圄，累及高堂，这本已令他心痛万分，更令他心碎的是含辛如苦的祖母竟未等到父亲平反昭雪的那一天就离世而去。父亲后来拿着补发的工资，对着祖母的亡灵大哭一场，含泪赋诗“每忆呻吟肠欲断，可怜一病不回春；抚儿历尽艰难日，压线年年玉体销，昏灯冷月悲慈竹，帷幕凄凉吊晚萱”。1974 年，年仅 56 岁的母亲也撒手而去，不由我心痛欲裂。母亲自幼家贫，自从嫁于父亲后，侍奉婆母，和睦亲朋，相夫教子，内助经营家计，外辅谋职工作，分挑家庭重担，她的善良勤劳无不为人称颂，但在“赵夫人”的名衔下，她却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与父亲共历了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

母亲去世令父亲痛不欲生，在极度的精神打击下，父亲身体也垮了，得了肠癌而病倒。在绝症的折磨下，他细舔心底的伤口，痛悼逝世的母亲，作“哀诗集”悼亡诗一卷以抒思妻之情，赋诗“精卫难填东海恨，女娲乏术补情天，恨如江海泪如丝，月缺花凋情欲痴”，以表达多年来忙于工作，忽略家庭的无限痛楚。病痛中的

他仍在坚持，他深信昭雪的一天终会来到，他还有许多理想没有实现，他不能就此躺下……这样的信念一直支持着他，支持着他战胜绝症，支持着他等到了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得到了昭雪平反，在他的身上重新燃起无限生机，这时他已从厂里退休，但他仍时刻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鞭策自己，本着务实精神，热衷公益事业，积极参政议政，直到耄耋之年仍拖着病体，为社会做了大量工作。

80年代初，百业待兴，无论是恢复生产还是发展经济，都离不开人才培养，邓小平同志说“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又说“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将成为开创21世纪大业的生力军”。这些话与父亲的历久弥坚的教育是兴国强国之本的思想引起共鸣，60年代的办学梦重又在他心底复燃。

他的办学创意一石千浪，很快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以及原椒江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资金问题困扰着父亲，使他食不知味，夜不成眠。80年代初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可能提供一笔如此庞大的资金，且教育不是能出投资回报的产业，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父亲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为了筹资，他与他的朋友王子鑫先生一起奔波于椒沪之间，将办学的蓝图向港胞沈炳麟先生勾勒，激起了沈先生的爱国热情，答应解囊助学。

80年代初人们对引进“外资”办企业的概念很淡薄，何况以“外资”办学，我不禁对年愈古稀的父亲有这等远见灼识而钦佩。引进外资需不懈努力，征地基建又谈何容易，为了征地，父亲顶着破坏良田的罪名，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去大队做说服工作。这段时期，家里做好饭等他，常常等到日落西山、等到万家灯火，才见他拖着疲乏的身子柱着拐杖从巷口走来。

当“三梅中学”首期工程于1984年7月底在翠环山畔建成时，父亲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

两年后为了扩建三梅中学，父亲决定再次赴沪募款，但这时父亲病情恶化，出现了便血，有过肠癌史的父亲心中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然而不管如何，1986年初，父亲执意要亲自赴沪去见沈先生。父亲在建校过程中的高效、优质、俭省、求实的工作精神令沈先生敬佩，他和朋友的赤诚之心再次感动了沈先生，一次捐款35万元，建造高中部3000平方米。但父亲回来后病情加剧，1986年下半年76岁高龄的父亲不得不赴沪做了肠切除手术。此时我们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姐弟四人同去上海陪护，眼见父亲病成这样，又想起母亲早逝，多么希望他停下来歇歇，希望他健康长寿地生活着。我们劝他“你已无愧于党和人民，该歇歇了”。可是当他出院后，就不顾医生和我们的劝告，说：“我年老有病，有些事怕是做不完了，可是能做的还是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直到1996年病瘫，他仍

坐在轮椅上为社会事务操劳。

在建校过程中力尽艰辛，在市府的支持下，父亲和他的朋友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呕心沥血，从引进资金、征用土地、规划基建到管理学校，大到资金土地落实，小到一个板坑填平都要躬亲实践，从新生入学到校风形成，为了下一代，为了祖国的明天，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以父亲为首港胞捐资筹创的三梅中学，至今已建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完全中学，是全国千所特色学校之一，全校共有建筑面积 7849 平方米，可容纳 1500 名学生。父亲出任该校董事长。他对莘莘学子，寄予殷切期望，书写校训，希望他们勤奋学习，求实工作报效祖国。

父亲何止满足办一个三梅中学，为适应椒江经济发展，急社会之急，实行多层次多渠道办学，1983 年，父亲带领民建、工商联的同事办起了椒江会计夜校，在此基础上，自力更生办起了建联职业学校，并开设了英语、日语、电脑课，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我不禁想起 90 年代社会上流传“不懂英语与电脑将成为新时代文盲”而父亲早在 80 年代就有此认识 这真知灼见何等可贵！

父亲在政协分管文史工作，1981 年由于椒江市新成立，这项工作是个空白点，文史工作只好从头开始。对此，父亲专门提出关于文史工作的意见，采取广泛发动，广征博采，深挖材料，扩大范围，通过几年努力，

选写、征集、编印、印发了七期文史资料，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不断增加和提高，并从本市扩大到港台，特别是第 5 期（怀念周宪文）专辑，除了亲自赋诗外，还得到周谷城、吴大琨、许杰老教授的题字和文章，为专辑增光，并有 20 多本寄往台湾，不仅周宪文教授在病榻上感激涕零，台湾暨大师生阅后深为赞许，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父亲不仅在事业上有成，而且还工诗词能书法，任椒江诗词学会会长。有诗稿两卷名为“红梅室诗稿”，取红梅傲霜之意。书法挺秀可观，东山公园入胜亭对联和三梅中学、建联职高学校校训均出自父亲手笔。

1996 年，姐姐大学同学、当代诗人余文法来家看望病中父亲，并见到他案头的诗集和书法十分惊叹。

父亲去世后，有人赞誉他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但更多的人对父亲的无私与清廉、俭朴与真诚以更高的赞誉。当父亲升任同康总经理时，乡亲们认为同康分支机构七八处，遍及台州和宁波，有似小县长，可以发财了，于是借钱的、找工作的纷至沓来，祖母也提出要他安排叔叔进厂工作以解后顾之忧，叔叔一向勤劳踏实，何况患病时祖母重兄轻弟留下残疾，父亲深怀内疚，如今安排工作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父亲没有同意，宁可咬咬牙长期分担叔叔家的生活，也不愿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事。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违背祖母意愿，父亲在忠孝难

以两全之下留诗遣怀“生前此事违母意，追远空怀堂北萱”。

父亲虽然贵为总经理，在外人看来，他完全有权可任意支用厂里钱钞，可他从未乱用过分文。1947年父亲朋友李锦然先生丧偶再婚邀父母参加婚礼，那时我们通常穿路桥土布织的衣，母亲出门没有出客衣，于是父亲咬咬牙给母亲买了一件藏青呢旗袍，以此装装门面，不想有人将母亲穿着打扮，传给大溪老家祖母，她老人家捎信来说：“我纺棉花过光阴，你全忘了家境”。父亲是个大孝子，这一顿批评使他有口难言。

父亲关心着求助他的人，一对夫妻在父亲的帮助下落实了政策。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一个酷热的中午，他们从乡下赶来，手提重礼登门致谢，父亲见状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要感谢就感谢党的正确伟大，切不可礼谢我”，父亲拒礼于门外，急得他们跺脚掉泪。邻居不解，误以为父亲与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争执呢，听了原委，他们交口称颂父亲的清廉作风。

父亲晚年身体不好，疾病缠身，我们劝他多加营养，他却说“吃饭就是吃饭为原则”，断断不肯多食菜肴。有时我们给他买些滋补品，他还会批评我们太浪费，转手便把东西拿来转赠他人。他平生最大的嗜好无非是吃点东坡肉，喜穿圆口千层底布鞋，而当他得知亲戚朋友有困难时便会毫不吝啬慷慨解囊。

父亲对朋友怀有极深的感情，在他的一生中，“朋

友”两字所占份量很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父亲给予最大的帮助，关心他们的政治生命、经济生活，使他们重新实现人生价值，朋友们无不感激地说“难报知遇之恩”。父亲病倒后，友情对他而言尤为珍贵，在我家的阳台上，经常围坐着不断来探望父亲的老友，谈笑间流露出无限浓厚的深情。父亲的朋友中既有同辈也有忘年交，既有家乡的也有天南地北的，他们之间的友情通过邮件如雪片似的向我家飞来，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骏写信说：“每次读表伯来信，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我在教育界 30 多年，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总算有所了解，对现今文化界名人也有所接触。说实在，无论人品、文章、才华、书法等各方面像表伯的不多。表伯听了这些可能说我在胡发议论，我却自认为是有感而发的。”父亲喜欢历史，因此与这位历史学家成了忘年交。1997 年我昔日好友孟君率全家从大连来探望父亲，父亲高兴得嘱我给他换上新装，迎接远方来客，他们带了东北奇珍补品送给病中父亲。当父亲见到他们时高兴地说：“这礼物真稀罕，但比这更珍贵的是你们千里来看望我的情深。”晚年，朋友成了他在病榻上的精神支柱。在他弥留之际，已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当他 88 岁寿辰即将到来前，他向我们提出要宴请宾朋。对此我们难以理解，认为有病应静养，不应为琐事所扰，后来在他不经意的谈话中我们深深理解了他的隐痛，他说“我这一生从未请人为我祝贺，这是我最后一次，我渴望与他们生聚与